

中國傳統歷史啓蒙教育初探

張 心 愷

一、前 言

世界每一個民族和國家莫不重視歷史教育，歷史敘述往事之蹟，讓後人瞭解前人的經驗，藉以延續傳統、凝聚共識、引為借鑑，本身便包含有教育的意義。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最初之史嗚呼起？當人類之漸進而形成一族屬或一部落也，其族部之長老，每當游獵鬥戰之際暇，或值佳辰令節，輒聚其子姓，三三五五，圍爐藉草，縱談己身或其先代所經之恐怖所演之武勇……等等，聽者則娓娓忘倦，興會飄舉，其間有格外奇特之情節可歌可泣者，則蟠踞於聽眾之腦中，滯拔不去，展轉作談料，歷數代而未已，其事跡遂取得史的性質。」¹這說明了「歷史」的起源，也說明了人類有了意識與語言，就有了歷史知識與歷史教育。

過去關於歷史教育的研究，大多偏向於探討當代歷史教育的教材與教法，對於具有數千年傳統的歷史教育則少見研究²。即使有，也是偏重於精英教育，並認為一般大眾的歷史知識來源，來自戲曲與小說³。然而中國另有一個歷史十分悠久，且相對於精英教育更為普及的教育傳統——私塾教育，這也是開始接觸有系統文化傳承的啓蒙教育。歷史教育在其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甚至所編纂的啓蒙教材《三字經》，仍傳頌至今。本文便希望對於這個為人所忽略的教育傳統中的歷史啓蒙教育，作一初步探討。由於能掌握的資料，主要在教材的部份，故僅就教材內容來作分析，以瞭解傳統歷史啓蒙教育之內涵。

二、傳統啓蒙教育概況

1. 私塾與蒙師

我國歷代私家教學頗為發達，其效率更較官學為大。這種情形，直至近代新式學校制度產生，私家教學的勢力始漸磨滅。所謂私家教學，自蒙學至專門學科，皆有人設立。因此學塾的程度範圍極廣，自五、六歲初蒙，以至二十歲左右讀完了四書、經學做八股，都可以由學塾去教。所以學塾中的學生，年齡有時自五、六歲直至十五、六歲的都有。那專教蒙童的稱為蒙館，專教大學生的稱為經館。這種學塾的歷史，或謂始自漢朝，而且一直沒有多大變化，這是我國歷代唯一的基本學校，而私塾教師也是讀書人做官以外主要的出路⁴。蒙學有多種辦學形式。一種是民間知識分子設館授徒，其中有常年設館，教師以教書為業，收取束脩；也有季節性開館的，於農隙之間召集本村和鄰村子弟入學，教師過著半耕半教的生活。另一種形式是村中大戶人家出資建館聘師，本村子弟免費入學，稱為義學。同義學相似的還有族學，即同宗之人聚族而居，有嚴密的家族組織，家族的族長支用族產興辦學校，供本族子弟入學就教。此外，還有所謂家塾，即大戶人家用高薪聘用有學的教師到家塾教授本戶子弟讀書⁵。



啓蒙學生拜至聖先師孔子情景⁶

塾師招收的學童，往往有啓蒙的兒童，也有攻讀經史、寫作詩文、較大年齡的學子，不分年級，由塾師依人施教。每年農曆一月十五日後擇日開館，學童入學自備桌凳，「學金」各館自定，每月繳交（農村有些私塾規定交木、米、油、菜等實物作學金）。此外逢節日要給塾師送「節儀」⁷。在民間習俗中，孩童初次入學是相當慎重其事的。村塾開學時，新學童入學要舉行啓蒙儀式，學生在孔子牌位（或畫像）前焚香點燭、下跪叩頭。塾師在案前念誦出自《三字經》的贊詞：「幼而學，壯而行。上至君，下澤民。揚名聲，顯父母。光於前、垂於後。」這叫拜聖。接著學童向塾師鞠躬作揖，給塾師送上「贊敬」（學金），這叫拜師⁸。由這段誦詞充份顯示，傳統中國人對小兒成長的期許，與未來成就的期待。一般而言，上課時間，一年除了三節（端明、端午、中秋）外，每天早上七點多就開始上課，下午黃昏了才放學。三節各放假一、兩天，過年則放假一個月，稱爲「放年學」，作息頗爲規律⁹。塾師若從外地來，也只能「開學不回家，清明到端午。」¹⁰



私塾先生上課情景¹¹

在古代，蒙師是教育地位最低者。唐代韓愈在《師說》中說：「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明顯地把蒙師排除在「傳道、授業、解惑」的教師隊伍之外¹²。只因蒙師大多由落第秀才充任，

他們滿腹經綸，只是考運不濟，只好以教私塾餬口；也有些人本來就沒啥學問，教書只是誤人子弟。南宋陸游的〈秋日郊居詩〉：「兒童冬學鬧比鄰，據案愚儒卻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面看人。」¹³生動地描繪出一個平時閉門大睡，任憑孩子嬉鬧，卻仍鄭重其事講說村書的「愚儒」形像。清儒牛應之〈兩窗消意錄〉裡也有一首詩嘲諷此類學究：「漆黑茅柴屋半間，豬窩牛圈浴鍋連；牧童八九縱橫坐，天地玄黃喊一年。」¹⁴又如〈村學先生自敘〉充滿了塾師的自悲自嘆：

「每憶少年時。通今博古。焚膏繼晷。窗前勤苦十年餘。學成文武藝……爭奈命途多舛。時運不濟……徬徨三思。不知所之。記得古人有句話。財主敗落便教書……自家日常看著幾個書生。羈羈絆絆。與犯罪囚徒無異。年終算著幾擔束脩。多多少少。與僱工行當不殊……可知村學堂中。埋沒了多少高才的漢子。枉屈了多少絕學的男兒。」¹⁵

〈塾師四苦〉又道盡教書之苦：「清晨便教書。口舌都乾苦。方纔教寫字。又要教讀古。先生偶出門。小子滿堂舞。……臨期候修金。看看日將脯。若還不至誠。留待後來補。此際好淒涼。問君苦不苦。」¹⁶如此工作辛苦，收入微薄又不固定，無怪乎諺云：「家有二斗糧，不作小兒王」¹⁷。

然而，也有一些蒙學教育專著反覆指出，要教好學童，關鍵在選擇好蒙師，提高蒙師的地位。崔學古說：「為師難，為蒙師更難。蒙師失，則後日難為功；蒙師得，則後來易為力。甚矣，不可不慎也。」¹⁸唐彪也說：「人之為學，第一在得明師。」而明師的標準為：一「嚴」、二「勤」、三「學優」，「三者兼備，乃明師也」。他對社會上「僅知尊經師而不知尊蒙師」的風氣提出責難，認為「人生平學問全在十年內外」，無論讀經、書法、作詩文，打基礎「全賴蒙師」。且蒙師工作之辛苦，亦過於經師。「蒙師教授幼學，其督責之勞，耳無停聽，目無停視，唇焦舌敝，其苦甚于經師數倍。」因此蒙師應該得到尊重¹⁹。袁文〈甕牖閒評〉便談道：「…其家延先生，敬禮備至，遂得成名。」朱弁〈曲洧聞聞〉也有這樣的記載：「屯留王誥應舉，夢胡僧賀之曰，君教童子，用心篤志，不負其父母所託，為有陰德。」²⁰一為長大成名後，歸功於蒙師的教導；一為蒙師克盡職守，因而有好報，皆對蒙師有正面的評價。

2. 教育內容及教授方法

蒙養階段的教育內容主要是進行初步的道德行為訓練和基本文化知識的教學，如朱熹的《小學》一書，即以立教、明倫、敬身、稽古為綱，「稽古」便是注重歷史基本文化知識的認識。在道德教育方面，雖極力強調儒家倫理，卻不失之空泛抽象，而將之落實在生活儀節和行為習慣的訓練。如朱熹的《童蒙須知》對此就有詳細而嚴格的規定：

「凡為人子弟，當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當令潔淨，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復置原所，……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仔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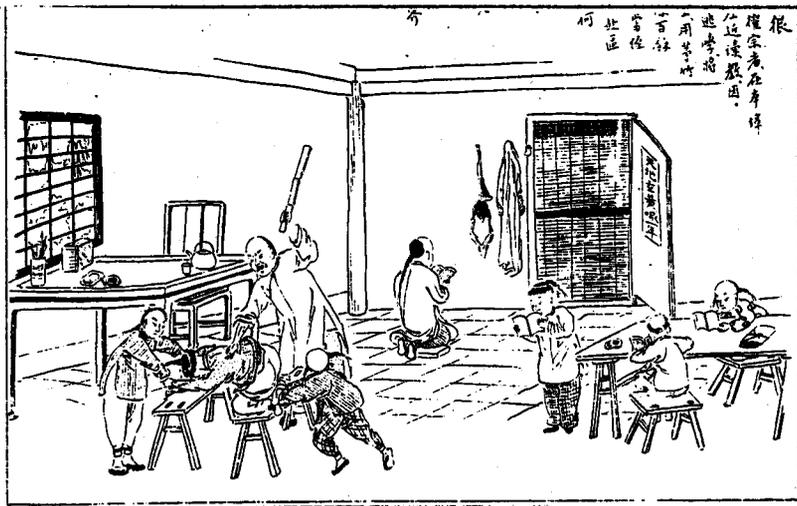
21

特別強調要從小嚴格訓練，打好基礎，使之習慣成自然。並認為「必使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²² 深刻地闡明了知識教學與道德培養的相互關係，同時強調行為習慣訓練的重要性。

關於私塾課程，元初程端禮訂有「分年讀書日程」，大體是一種較全面的教學計劃——八歲入學，先讀經，繼讀史，再讀文²³。清朝龍啟瑞也曾草擬制訂《家塾課程》，大致是「以讀、看、寫、作四字為提綱，讀熟書（經類）以沃其義理之根，看生書（史類）以擴其變通之趣，寫字以觀其用心之靜躁，作文以驗其養氣之淺深，四者具而學生之基業始立。」²⁴ 可見，經、史、文為中國古典教育的三大支柱，歷史教育在其中佔有重要地位。

傳統啟蒙教材，以識字、習字、倫理為主，大體可分為三類：一為字書，即所謂的「小學」教材，專為兒童的識字教育而編寫。《千字文》是自唐代以後兒童必備的讀本。以後的《百家姓》和各種《字書》皆屬此類。第二類是蒙求，為句法整齊押韻的歷史故事，編採的都是歷史人物的事蹟。後來有《左氏蒙求》、《十七史蒙求》等緣此體例。第三類是格言，為治家立身之言，用以垂訓子孫，如《太公家教》、《神童詩》、《增廣賢文》等。此外，詩選亦頗為流行，如《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²⁵。蒙學中使用廣泛的四種教材，便是合稱

「三、百、千、千」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這些教材以整齊押韻、淺顯易誦、趣味盎然，兒童聞而易曉的方式，內容涵蓋經、史、文的古典文化精華，以及自然、社會、歷史、倫理等日常生活知識，以達到啓發童蒙，識字、習字、倫理的教育目標。



《人鏡畫報》載：塾師體罰學生情形

私塾的教法，似乎很簡單。蒙童的重要活動是讀書、識字、寫字。讀書方法重朗讀，先由教師口唸，學生隨讀，隨讀數遍後，學生回位自讀，必須讀熟，至規定時間，至教師位前，掩卷背誦。記憶不熟時，便常受鞭撻²⁶。習字分為描紅、蒙帖、臨帖。描紅是塾師用土紅在紙上寫字，學生再用墨筆填寫。蒙帖是塾師寫好範字，學生用紙蒙著寫。臨帖即是按字臨摹。塾師對寫得好的字用紅筆圈點，俗稱「吃蛋」；劣字在旁邊劃一豎，俗稱「吃紅甘蔗」²⁷。私塾大都採取個別教學制，誰的書先讀完，誰就先換一本新書，充分做到因材施教，有教無類²⁸。實際上，私塾的教學品質全憑塾師個人的治學和教學經驗，良莠不齊，然而它普遍開設、靈活多樣的形式，卻承擔了古代中國為數眾多的童蒙教育，對普及文化知識具有重大貢獻。

三、「典故類」的歷史啓蒙教材

1. 唐代—李翰《蒙求集註》

中國傳統蒙學教育課程中，經、史、文三足鼎立，歷史知識是童蒙教育中重要的一環。中國具有悠久而長遠的歷史傳統，並反映在歷史教育中，孔子教授《春秋》，開始了我國專門的歷史教育。然而隨著年代久遠，史書累積汗牛充棟，如何選擇史事作為教材的內容，尤其是使初次接觸「歷史」的幼童能感受到歷史的興味，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梁朝周興嗣所著的「千字文」可說是我國最早的一本啓蒙教本，自隋、唐至明、清，凡一千百餘年，皆採作兒童教材。其內容包括天文、地理、歷史、人倫、教育、生活等各方面，四字一句，凡二百五十句²⁹。在歷史方面所提及的，僅有二十餘句，諸如：「晉楚更霸，趙魏困橫，假途滅虢，踐土會盟……等。」³⁰這種以四字寫成的韻語，成為我國古代啓蒙教材編撰的通例；到了唐朝，李翰依此形式著有《蒙求》，編採的全是歷史人物的事蹟，可說是最早的一本兒童歷史啓蒙教材，它同時也是「典故類」歷史教材的創始，盛行於唐、宋、元、明，後世援此體例者頗多。

《蒙求》的書名，當源於《易經·蒙卦》，其卦辭：「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彖辭：「蒙以養正，聖功也。」³¹書名便標明了這是一本以兒童為對象的讀物。李華在《蒙求·序》中介紹：「安平李翰著『蒙求』一篇，引古人言行美惡，參之聲律，以授幼童，隨而釋之，比其終始則經史百家之要，十得四五矣。每行注兩句，人名外傳中，有別事可記，亦比附之。雖不配上文，所資廣博。從切韻東字起，每韻四字。」³²將古人行事美惡，用四言韻語表達，並各於二句韻腳下附注其事略。一方面，希望兒童讀了本書，不僅可以自古人行事的美惡知所鑑戒，也可以藉以明瞭經史的概略。又因為它是以四言韻語的方式表現，也充滿了韻對的文學意味。在韻腳之下加以附注，等於是教師手冊一般，便於塾師詳細講解人物典故之緣由。這種史注是歷史考據中的一個重要形式，它最主要的作用在於「達事明意」為主³³。由於年代久遠，宋朝徐子光「漁獵史傳，旁求百家，窮本探原，摭華食實」為之作補注，使之更加充實、清楚而普遍流傳，自後宋室諸家家塾各有《蒙求》³⁴。

蒙求集註卷上

王戎簡要 裴楷清通

晉 李瀚 撰
宋 徐子光 補註
昭文 張海鵬 校

王戎簡要裴楷清通
晉書王戎字仲道瑯琊人幼而穎異神彩秀微
視日不眩裴楷兄而目之日或眼爛即令下簾阮
瞻弟與之交籍每通渾去輒過視友良久然後出
十歲日始冲清貧非幹餉也共卿官不共阿戎英
歷官至司徒○晉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明悟有
識且少與會名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共選也郭
郎缺希問會名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共選也郭

蒙求集註卷上
是用借借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得步卓特精理漢
時節出入官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嘗昨探象以中
世教多少既而得一不悅衆臣失色枯曰臣聞天得
天下貞帝大悅累遷中書令侍中

孔明臥龍呂望非熊
蜀志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躬耕隆中好為梁父吟每
自比管仲樂毅時先主屯新野州不徐庶見之謂曰諸葛
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早顧見之乎此人可與共成大事
致宜往也然時先主遂詣亮凡二往乃見因屏人與
對事言之於是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曰
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勿復言及稱尊號以
亮為丞相漢書春秋曰光家南陽鄧襄與亮同郡
大得焉非熊非虎非龍非馬非鳥非魚非人非物非
之在國施及三王文曰亮是也史稱曰編之乃太
祖史稱亮為太公望非龍非馬非鳥非魚非人非物
歸正身師本公望非龍非馬非鳥非魚非人非物
是正其身師本公望非龍非馬非鳥非魚非人非物
所獲非龍非馬非鳥非魚非人非物

楊震開西 丁寬易東
後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明經博覽無
不究充諸儒命數十年來講之譽著而志愈高若夫
潮不若州郡命數十年來講之譽著而志愈高若夫
有冠在街三鮑魚數十年來講之譽著而志愈高若夫
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十年來講之譽著而志愈高若夫
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安帝時為太尉自比升
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十年來講之譽著而志愈高若夫
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安帝時為太尉自比升

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十年來講之譽著而志愈高若夫
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安帝時為太尉自比升
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十年來講之譽著而志愈高若夫
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安帝時為太尉自比升

〈李良薦《蒙求》表〉云：「竊見臣境內寄住客、前信州司倉參軍李瀚，學藝淹通，理識精究，撰古人狀跡，編成音韻；屬對類事，無非典實，名曰蒙求，約三千言。注下轉相敷衍，約萬餘事。」³⁵就本書的內容而言，除了書末的「浩浩萬古，不可備甄，芟煩摭華，爾曹勉旃。」四句結語外，從開篇的「王戎簡要，裴楷清通。孔明臥龍，呂望非熊。楊震開西，丁寬易東。謝安高潔，王導公忠。……」。到近尾篇的「鮑照篇翰，陳琳書檄」，共計五百九十二句，寫的就是自上古到魏晉南北朝間五百多位人物的五百九十二則故事。在這些故事中，有的是人物事蹟的介紹，如「匡衡鑿壁，孫敬閉戶」，述說匡衡鑿壁借光、孫敬閉戶懸樑苦讀的故事。又如「蕭何定律，叔孫制禮」，說明漢初，蕭何作律九章，叔孫通制定朝儀，幫助漢高祖定天下、治群臣的歷史。有的是人物的品評，如句首的「王戎簡要，裴楷清通」，或「謝安高潔，王導公忠」，或「桓溫奇骨，鄧艾大志」，可說是延續了魏晉月旦臧否人物的餘風，也是對歷史人物進行評價。其中也有不少文化史內容，如「谷永筆札，顧愷丹青」，記載西漢谷永對於經書泛為疏達；晉顧愷之善於丹青圖寫。或如「程邈隸書，史籀大篆」，「蒙恬制筆，蔡倫造紙」，說明隸書與大篆、紙與筆的創始者。還有，雖然比例極少，但敘述婦女事跡，如「齊后破環，謝女解圍」，述說戰國機智的齊國皇后，勝過群臣，解開了秦始皇玉連環的難題；以及晉謝道韞，聰識有辯才，為小叔吟

詩解圍的故事³⁶。賦予了古代婦女正面的形象。如此將相類、相對的故事，編成四言韻語，既呼應了兒童愛聽故事的喜好、愛大聲朗讀的樂趣；押韻的四言韻語，也便於兒童在記憶力最強之際，易於記得大量的歷史典故，擴大兒童的歷史知識，並從此中吸收前人經驗，以歷史人物為榜樣。

《蒙求》的教學效果就李瀚自身的經驗而言，似乎頗為卓著。〈李良薦蒙求表〉中便提到：「瀚家兒童三數歲者，皆善諷讀；談古策事，無減鴻儒；不素諳知，謂疑神遇。又云錯綜經史，隨便調釋童子，則固多弘益，老成亦頗覽啓予。」³⁷將自家的小兒調教成神童一般，談論起古策事不亞於鴻儒，可見《蒙求》衆多紛紜的人物故事、廣泛的涵蓋面、容易記憶的四語成韻，得以讓兒童擁有豐富的歷史知識。

然而，《蒙求》作為兒童歷史教材，也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它的選擇標準，並不全然是歷史事實，也有一些取材自小說、志怪的故事，如「庶女振風，鄒衍降霜」、「女媧補天，長房縮地」是取自《淮南子》的陰陽、道家神話故事；「蘇詔鬼靈，盧充幽婚」則是取材自志怪的鬼神傳奇。王觀國〈學林卷七〉便就此批評道：「唐李瀚撰蒙求五百九十八句，每句著一人，每一人著一事，非博學不能為此，然其疵在於一人，而分作二句，或三句，又其所著不皆出於經史而間取小說雜書，如搜神記、神仙傳、幽明錄、志怪集，小說雜書多妄誕不可取信，而瀚取此與經史同列，非訓蒙之所先也。」³⁸因此，它並不合乎歷史教育「求真」的基本前提。其次，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指出：「（蒙求）本無義例，信手肆意，雜襲成章；取其韻語，易於諷誦而已。遂至舉世誦之，以為小學發蒙之首……。」³⁹這樣的教材缺乏歷史時間的向度，只是一個一個孤立零散的人物與故事，不知人物的時代背景，也看不出歷史縱深的發展變遷，它表現不出歷史最重要的「時間」要素。除此之外，由於年代久遠，李瀚原注失散，儘管徐子光曾為之補注，仍有許多典故，「其事未詳，莫知何據」⁴⁰。所以它主要是作為一種「典故故事」集，若嚴肅地以歷史教科書的要求來看待，《蒙求》並不十分理想。

2. 元代 — 吳化龍《左氏蒙求》

繼李瀚的《蒙求》後，記載人物典故、押韻成文的歷史著作還有很多種，元

《左氏蒙求》一開始以「平王遷都，隱公攝位；宋魯屢盟，周鄭交質；州吁無親，叔段不義；桓公問名，羽父請諡」，揭開了諸國爭霸、禮壞樂崩、動亂的春秋時代。一如《蒙求》，它以一個一個的人物串連出整個時代：「州吁無親，叔段不義」敘述衛國州吁殺兄自立，依賴兵威、安於殘忍，導致衆叛親離；以及鄭國母后武姜偏愛共叔段，莊公即位後，叔段擴權，莊公指其多行不義必自斃的故事。「桓公問名，羽父請諡」敘述魯桓公兒子出生，向申繻詢問命名；以及魯卿無駭去世，羽父爲他請求諡號和氏族。「魯隱觀魚，衛懿好鶴」敘述魯隱公到棠地觀看漁人捕魚，臧僖伯提出勸戒不合於禮；以及衛懿公喜好飼養仙鶴，甚至仙鶴出門乘大夫的車，當狄人打來，士兵都氣憤地說：派鶴去抵擋敵人吧。還有「鄭伯肉袒，許男面縛」；「韓子見禮，季札觀樂」……等。全書四字一句，兩句相對，每八句一段，共有八十二段、六百五十六句，每句下面有清代許乃濟與王慶麟爲之作注，詳細說明每一典故的年代與故事，同樣便於塾師講解。如此將《左傳》全書十八萬餘字，二百五十年的春秋爭霸，重新編排、濃縮簡化、參爲對偶、聯以音韻，使之更爲簡潔、便於記憶，的確若非對左傳精熟不能爲之，由此顯示吳化龍之功力與用心。

儘管如此，這種編纂方式卻存在著一個相當大的問題。爲了要牽就對偶、押韻，如州吁「無親」對叔段「不義」、桓公「問名」對羽父「請諡」，所以它並不依照《左傳》故事發展的時間順序來編排，而是一個一個各別人物的言行、事蹟。雖然對仗工整，唸來順口，這麼一來，卻看不出事件的先後發展，也看不出情節發展的因果關係，使左傳的精華特色全然消失。《左傳》的史學特色在於：呈現出年、月、日的歷史秩序，尋求人們行爲的因果關係，匯而成一個時代演變的整體因果關係，歷史乃以有機體的構成秩序，復活於吾人之前。並藉以瞭解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以十分筆力、寫十分人情，充份顯現出歷史的生氣與活力⁴⁵。相對的，《左氏蒙求》不僅呈現不出歷史的血肉、精神，甚至連歷史發展的骨架也談不上，仍只是一堆零散的、不相連屬的人物事蹟。即使將《左氏蒙求》通篇背得滾瓜爛熟，恐怕仍對春秋時期整體的歷史發展，不甚了了，只知道一個個的人物典故故事。

《龍文鞭影》一書，在內容上與形式上，可說是《蒙求》的翻版，它收輯了兩千餘則的典故，歷經宋、元兩朝，人物的典故當然比唐代的《蒙求》更多。一如《蒙求》的體例，四字一句，兩句相對，押韻成文，便於幼童背誦。每一句之中，都包含著一個典故；每句之下有著密密麻麻的小字注解，以供塾師講解。內容涉及古代政治、軍事、道德、文藝、儒林、方術、怪異、奸佞等諸多方面。一開始的四句：「麤成四字，誨爾童蒙。經書暇日，子史須通。」⁴⁹說明了《龍文鞭影》的編纂方式：正文以四言一句，上下兩句對偶，逐聯押韻，兒童易於吟誦、記憶。以及著書目的：學習四書、五經之餘，對諸子百家、二十四史也須融會貫通。接下來的「重華大孝，武穆精忠。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商王禱雨，漢祖歌風。……」除了介紹政治人物外，還有在學術文化方面有重要成就者，如「孔門十哲，殷室三仁」、「何晏談易，郭象注莊」、「朱熹正學，蘇軾奇才」、「溫公萬卷，沈約四聲」等。著名的文學家、藝術家，如「淵明賞菊，和靖觀梅」、「能詩杜甫，嗜酒劉伶」、「會書張旭，善畫王維」、「篆推史籀，隸善鐘繇」等。此外，還有眾多的民間傳說，如「壽昌尋母，董永賣身」、「子晉牧豬，仙翁祝雞」、「漁人鵝蚌，田父逸廬」、「琴高赤鯉，李耳青牛」、「達摩面壁、彌勒同龕」……等。最後，以「古人萬億，不盡茲函」作為結束。

傳統歷史啓蒙教育中，「典故類」歷史教材的普遍流傳，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那就是中國傳統對歷史功用的看法，以及對歷史思考的方式。孔子教授《春秋》，開始了我國歷史的專門教育，並以歷史作為資治的龜鑑、治亂的藥石，與道德褒貶的利器。「借鑑」與「勸戒」便為史學的主要功用，也是歷史教育的主要目的。「借鑑」側重在研究歷代的興衰治亂，「勸戒」說明了歷史在人倫道德上的垂訓意義，以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⁵⁰。這就是所謂「鑒戒式的歷史思想」。在鑒戒式的歷史思想中，「歷史」這個概念，指的是事例的匯集，這些事例分別顯示出其中行為的成敗、得失，對後人有鑑戒的功能。讀歷史是認識事例，寫歷史也是保存有訓戒意義的事蹟。於是，把「歷史」視為許許多多事件的匯集；個別的事件與事件之間不一定有相互的關聯。所有的事件之間更不構成一個關係緊密，相互抑制或推動的完整過程。匯集這些個別而零散的事件有兩種最普遍的方式：一是以年繫事的「編年體」，一是以類繫事的「紀傳體」⁵¹。因此，以一個一個個別人物編排的「典故類」教

材，就宛如紀傳體中的「列傳」一般，它最主要的教育目的，便是在於提供「借鑑」與「勸戒」的歷史功用。但不足的是，它並沒有對這些典故加以分類，或有組織的編排，往往爲了牽就對仗與押韻，而顯得零散，失去了歷史最重要的「時間」因素。

四、「通史類」的歷史啓蒙教材

1. 宋代—王應麟《三字經》

除了「鑒戒式的歷史思想」外，還有另一種不同的歷史思考方式，那就是以歷史爲發展過程的「演化式的歷史思想」⁵²。在傳統的歷史啓蒙教育中，也有這種以「演化式的歷史思想」來加以組織史事的著作，也就是以時間演化串連起從上古到作者所處時代的歷史，在此我們將它歸類爲「通史類」的歷史教材。中國歷史上流傳最廣泛，影響最深遠的童蒙教材就是《三字經》，它可說是兼具了「典故類」與「通史類」的歷史啓蒙教材。同時，它內容廣泛地包括了天文、地理、生物、倫常、典籍、歷史等，兼具識字、知識傳授、人格教育，及培養語文能力等多功能，是一種綜合性的童蒙教材。因此，它流傳最廣，影響也最大。

有關《三字經》的作者，一般最普遍的說法，是宋人王應麟。卻有人懷疑可能是宋末區適子，或是南海黎貞所作⁵³。由於王應麟是宋末很有名的大臣，又學識通博，曾編有空前的大辭典《玉海》，又著有《蒙訓》、《小學紺珠》、《補注急就篇》、《小學諷詠》等有關童蒙教育的書籍，對童蒙教育頗爲注重，所以後人便將《三字經》也歸入他的名下⁵⁴。無論如何，像《三字經》這樣的書是不會突然出現的，南宋的若干思想家、理學家、文人逐漸開始注意普及教育，可能已經有人編寫過一些通俗讀物，如陳淳的〈訓蒙初誦〉，可能就是《三字經》的前驅。不論是王應麟或區適子，都是宋末元初的人，把他們說成編者，意味著遺民爲了保持他們所心愛的文化，凝煉成一些三個字的口訣，力求其普及，在民間種下深根⁵⁵。故《三字經》可說是經過許多人，不斷推敲字句、進行改編，而成爲童蒙書的成熟結晶。

有關歷史教育部份，以「經子通，讀諸史。考世系，知終始」爲開始，正如啓蒙教育中，先讀經、繼續史的教學課程；讀史的重點則在於考世系、知終始。

於是接下來，列舉歷代分合、興衰，和年歲的久遠與短暫：「自義農，至黃帝，號三皇，居上世。唐有虞，號二帝，相揖遜，稱盛世。夏有禹，商有湯，周文武，稱三王。夏傳子，家天下，四百載，至紂亡。周武王，始誅紂，八百載，最長久。周轍東，王綱墜，逞干戈，尚游說。始春秋，終戰國，五霸疆，七雄出。嬴秦氏，始兼併，傳二世，楚漢爭。」⁵⁶將上古歷史，以非常簡練文字表達出來，並將各朝代重要的歷史意義點出：如堯舜的禪讓；夏朝是國史上第一個世襲的王朝；春秋戰國的禮壞樂崩，列強爭霸，最後由秦國統一天下。繼之「高祖興，漢業建，至孝平，王莽篡。光武興，為東漢，四百年，終於獻。蜀魏吳，分漢鼎，號三國，迄兩晉。宋齊繼，梁陳承，為南朝，都金陵。北元魏，分東西，宇文周，與高齊。」⁵⁷如此將兩漢以至魏晉南北朝的歷史交待完畢，尤其對於南北朝複雜的順序和分合，用簡潔的詞句表述出來。

接下來進入唐宋時期：「迨至隋，一土宇，不再傳，失統緒。唐高祖，起義師，除隋亂，創國基。二十傳，三百載，梁滅之，國乃改。梁唐晉，及漢周，稱五代，皆有由。炎宋興，受周禪，十八傳，南北混。十七史，全在茲。」最後，以「十七史，全在茲。載治亂，知興衰。讀史者，考實錄。通古今，若親目。」說明讀史的目的在於明白國家興衰的道理，研讀歷史尚需進一步去稽考原始的史料，藉以通曉古今歷史的真相，以及演變、發展的趨勢，這顯現了它具有相當的歷史意識，並十分重視通史的精神。全部僅僅以二百五十二個字，就把上古至宋朝的歷史，以簡練的文字、精確的概括說明清楚，句句成韻、通俗易懂，讀來朗朗上口，便於背誦。在極短的篇幅內，包含如此豐富的內容，而且非常有系統，實在是難能可貴。至於其後的「遼與金，皆稱帝。……」以迄「革命興，廢帝制。立憲法，建民國。」則是後人陸續加入，並非原本所有。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其「基礎知識」，如果不具備這些基礎知識，或這些基礎知識，學的不穩固、不紮實，不但這門學科學不好，甚至根本無法進入門徑。而歷史教學的基礎知識，就是年代、人名、地名，和專有名詞。因為「歷史」這一學科的特性、教材結構，就是由這些項目組成的⁵⁸。除此之外，「文史不分家」，語文能力的培養，也是歷史教育不容忽視的一環⁵⁹。由此一觀點來看《三字經》，就一本啓蒙的通史教材而言，可說已具備了相當充份的歷史基礎知識。它將整個中國歷史的朝代興衰，傳了多少世、多少年，一一娓娓道來，讓孩

童對國史的發展有一清晰的概念。同時，提及了重要朝代的開國君主，如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秦始皇嬴政、漢高祖、漢光武帝，以及唐高祖等。至於在地名方面，則顯示出「南朝」的概念，是因為定都金陵。同時《三字經》採取三字一句、兩句一韻，近乎兒歌的形式來編排，比七言、五言、四言更易於幼童唱讀習誦。所以誦讀《三字經》，無形中附帶讓孩童接受押韻、對仗等語文訓練，非但可以對傳統文化能有概括的認識，也可學習一些淺近的文言或押韻規律，為日後的語文學習打下良好基礎⁶⁰。所以《三字經》可說是一部相當理想的歷史啓蒙基礎教材，無怪乎其流傳之廣泛與深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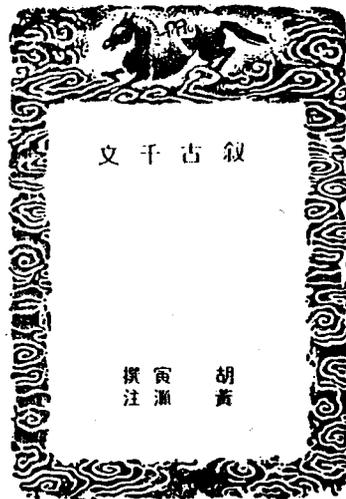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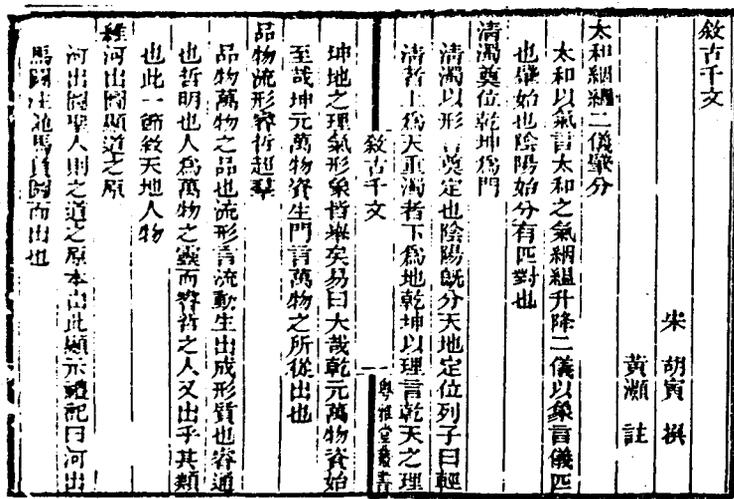
除了十七史「演化式」的歷史發展基礎知識外，接下來它也以「鑑戒式」的人物事例，來達成道德、勤學、苦學方面的情意教學目標。例如它提到「香九齡，能溫席。孝於親，所當執。融四歲，能讓梨。弟於長，宜先知。首孝弟，次見聞。」⁶¹以黃香溫席、孔融讓梨的故事，作為兒童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的楷模，並強調孝弟的人格教育，重於一般的知識教育。其次，還提到「昔仲尼，師項橐，古聖賢，尚勤學。趙中令，讀魯論，彼既仕，學且勤。披蒲編，削竹簡，彼無書，且知勉。頭懸梁，錐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螢，如映雪，家雖貧，學不輟。……爾幼學，勉而致。有為者，亦若是。」⁶²以孔子、趙普為例，說明即使如學問淵博的聖賢、功業顯赫的宰相仍然好學不倦。在以蒲草、竹簡作為書本的困乏環境中，仍不放棄求學。孫敬懸梁、蘇秦刺股的故事用以激勵發憤讀書的毅力。車胤以螢火蟲取光讀書、孫康利用雪光的反照來讀書，說明縱然家境清寒，只要有毅力、有決心、努力向學，將來也可有所成就。《三字經》更可貴的一點，是它完全站在一般平民家庭讀書兒童的立場，而非上層貴族或士大夫的立場，因此學的大都是貧寒家庭，苦學有成的例子，用以勉勵孩童，有志氣、肯努力，也可以像上述諸聖賢一樣留芳百世。

2. 宋代—胡寅《敘古千文》

作者胡寅曾任南宋淳祐年間的禮部侍郎，《敘古千文》的成書時間約略與《三字經》同時，皆為宋末元初。文後有理學家朱熹為之作〈跋〉，評介本書「敘事立言昭陳法戒，實有春秋經世之志，至於發明道統開示德門，……新學小童朝夕諷之而問其義，亦足以養正於蒙矣。」⁶³又有李昉英的〈跋〉更清楚地說明本書的背景：「文定胡公潛心春秋四十餘年，而後徐出其說，致堂其親，傳

故筆削皆有法。敘古字凡千不重，雖飲席閒談笑成之。」⁶⁴ 因此，它的難度不高，甚至只是「飲席閒談笑成之」，卻也是作者「潛心春秋四十餘年」後的成果，具有相當深厚的學術基礎。同時，就書名而言，它是沿襲《千字文》而來，強調字不重複，以作為識字教材。它的內容主要為：「上下數千載關繫大處，包撮略盡，興君昏主之理亂，哲佐悖臣之功罪，吾道異端之正偏，一字森嚴，百世確論，不但可以習童稚而已。」⁶⁵ 充滿了正氣凜然的春秋大義。

《敘古千文》的形式，一如《千字文》或《蒙求》，也是四字一句、兩句一韻，全書共二百五十句，整整一千字。從內容來看，更明確地顯現出它具有非常濃厚的理學思想。蓋宋明理學的特色在於，它吸收了佛、道的宇宙論，將之融入儒家思想，再建孔孟傳統。因此不論是「宋儒之首」的周敦頤、或「理學奠基者」的張載，都企圖在佛道的宇宙觀與儒家的現實倫常，搭起溝通的橋梁。其理論的結構邏輯，便依下列形式展開：本體論→宇宙論→人性論→認識論→倫理學（回歸到本體論）⁶⁶。《敘古千文》便是依循此一模式發展，最早由宇宙形成、開天闢地講起：「太和絪縕、二儀肇分。清濁莫位，乾坤為門。品物流形、睿哲超群。維河出圖，顯道之原。」⁶⁷ 典型的理學著作，一開頭總要講一大段理、氣、無極、太極之類的宇宙觀，這是一種前奏，為的是引出主題，主題則是重建以人的倫常秩序為本體軸心的儒家之道⁶⁸。於是逐漸落實到人間：「伏羲畫卦，爰始斯文。儼垂衣裳，下臣上君。軒轅通變，成于華勳。意誠心正，萬化生身。……」⁶⁹



雖然它具有相當濃厚的理學哲學色彩，但是對於歷史的敘述也有十分精采的部份。以唐朝為例，幾乎唐代重要的歷史基礎知識，都概括在內：「世民雄視，資受勇智。除殘滌暴，慕仁勸義。斗米數錢，外戶不閉。丞輔疇功，鑿亡一魏。玩黷句驪，猶橫壯氣。」唐太宗智勇雙全，實行仁義，開創了外不閉戶的貞觀之治，並得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等名臣的輔助。太宗伐高句驪，敗於其少年銳氣，深悔自己的玩兵黷武。其後，「北難遽晨，枝幹披瘁。狄傑扶傾，唐統薦繼。」武后專權，宗室遭摧殘，狄仁傑復立中宗，延續唐代統緒。接下來「霓曲喧轟，擊鼓駭沸。臨淮汾陽，汎掃氛翳。」安史之亂擊鼓喧天動地而來，由臨淮郡王李光弼、汾陽郡王郭子儀，掃除唐之妖氛。最後，「贊斬篡泚，度梟叛濟。貂璫專命，霜凝冰至。藩鎮交拏，虐悖狂恣。魚爛絲芬，吁嗟五季。」唐步入中衰，叛亂紛起，陸贄斬殺篡位的朱泚，裴度平定作亂的吳元濟。唐終於亡於內有宦官亂政、外有藩鎮割據。五代仍延續魚爛絲芬的壞亂局面，令人感到歎息。如此對於整個朝代的歷史發展，因何而興、為何而衰，因果關係的敘述清楚明白。

《敘古千文》最鮮明的特色便是全書充滿理學的色彩，因此對於儒家思想的發展，儒學大師的介紹，著墨甚多：從孔子「尼父將聖，體用皇極。魁圍莫害，陳餒那厄。刪定詩書，繫辭融索。晚潛奧思，筆削史策。姚姒以降，斟酌準的。日星炳煥，千古貽則。麟瑞應期，妙感孰測，樂育英才。升堂入室。伋蹈前軌，軻稟絕誠。標示中庸，攘距楊墨。主擇息傳，獨賴遺編。」到董仲舒的「董相仲舒，儒術窮研。請罪僻邪，乃績巍焉。」以及宋朝理學家程顥、程頤「喬崧孕秀，顏孟並轡。私淑諸人，追配洙泗。」而後批道、排佛、斥法家、墨家：「莊老虛談，佛釋空諦。申韓慘刻，朱翟偏蔽。」最後重新回到形而上的人性與天道合一，作為通篇的結論：「探蹟鉤隱，涵養精粹。達理制事，酬醜經緯。舉此加彼，兼善博施。參乎覆載，可謂大器。」⁷⁰由於《敘古千文》的理學色彩濃厚，又用字較為艱澀，使人望之儼然、曲高和寡、難以親近。李昉英的〈跋〉中便提到：「古千文猥陋不倫，乃盛行於世。俗蓋未知有此作也。」⁷¹對於它未能取代原來的《千字文》，頗為遺憾。

3. 元朝一王 《歷代蒙求》

王芮生平不詳，但由本書結束於「大元太祖，開基應天。……天子聖壽，億

萬斯年。」⁷² 可知本書應完成於元代。鄭鎮孫為之纂註的序，便表達出對衆多《蒙求》書的不滿：「吾嘗病其句，舉一事，摘偶碎文，世代後先，人品高下，雜乎其間也。」⁷³ 書後的跋也批評了盛行的《千字文》與《蒙求》，雖然它們都駢偶易讀，但「千文句以字集或乖其義，識字累千於事何益。補註蒙求，句以事對，多失其序，事未易記，蒙何以求。」⁷⁴ 本書因此特別針對這些缺失，加以改進：「此編歷敘帝王，古今世代，不繁不紊，纂註又從稽經據史，事理貫明，上下數千年之運，離合絕續，開卷可見，童蒙熟誦，逮長不忘，豈非行遠升高之基，有功後學多矣。」⁷⁵ 所以，本書雖名曰《歷代蒙求》，但它並非如一般《蒙求》的典故故事集，而是以通史的方式來編排、組織史事。



本書一開始，延續宋代理學的傳統，也是從宇宙的開天闢地開始講起：「太極未判，混然一氣。清濁肇分，高下莫位。輕清為天，重濁為地。中間為人，雜以萬類。」它比較特別的是會為歷史現象提出解釋，比如它解釋為何會有君主的出現：「惟人之生，於物最靈。血氣有欲，不獲則爭。力強相博，群眾相陵。不立之君，民何以寧。」所以開始出現伏羲、神農、黃帝。它的著述重點類似《三字經》，注重「世運之變、君之賢否、數之短長、或一統而瓜分、或既離而復合」，因此每一朝代的開國君主、亡國君主，歷經幾代、幾年，一一數來。以漢

朝的敘述為例：「漢高王帝，豁達大度。起自沛豐，光啓炎祚。傳十二君，文景富庶。二百中天，禍延平孺。」「新室王莽，謀竊漢璽。篡立未幾，滅于更始。赤眉入關，更立盆子。自有真人，應讖復起。」「天授光武，廟謨雄斷。奮跡南陽，削平禍亂。世傳十三，號曰東漢。再二百年，壞于靈獻。」⁷⁶短短的三段，將主要君王人名、時間、地名、專有名詞等重要歷史基礎知識，都包括在內。兼有人物評價與史筆的批判，真正做到「要提、意貫，可謂博而約、簡而明」⁷⁷。

就所見的「通史類」啓蒙教材，似乎集中在宋、元時期，其實是有其史學發展的背景。唐、宋、元時期，通史體呈現發達的景象：唐杜祐的《通典》匯通各朝典章制度，開創制度通史的先河；北宋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為編年體通史；南宋鄭樵寫作《通志》，是一部紀傳體的通史。這些事實說明，唐宋時期的通史觀念已大為盛行，各種史體都在努力求「通」。這不僅是社會上明變求通思想的反映，也是史學本身發展的必然趨勢⁷⁸。從《資治通鑑》又衍生出《通鑑綱目》、《通鑑輯覽》、《綱鑑易知錄》以及《通鑑紀事本末》等書，都是基於我們的歷史年代愈久，內容愈複雜，愈需要有簡要的讀本，以達成史書的通俗化⁷⁹。宋、元時期正由於有這樣的學術基礎與環境，因而產生了如此豐富、精彩的「通史類」歷史啓蒙教材，也代表了知識份子努力將有系統的歷史知識普及化的成果。另一方面，就《三字經》、《敘古千文》、與《歷代蒙求》三種教材而言，呈現出不同的難易程度。《三字經》可說是「基礎篇」，《敘古千文》與《歷代蒙求》則是可以作為銜接的「進階篇」，內容更深刻而廣博。然而，我們也看到了《敘古千文》與《歷代蒙求》的流傳，遠不如《三字經》普遍，主要是由於後者簡單、平易近人，與日常生活聯繫，符合兒童「多記性，少悟性」的年齡特徵。這是構成蒙學教材成敗的關鍵因素。

五、結 論

私塾教育是中國傳統教育中，最為普遍的一環，然而一般卻認為教小孩讀書、識字，沒有學問，而不甚重視。其實，作為一種基礎教育與大眾教育，它的影響與意義是非常深遠而重要的。蒙學教育主要是進行初步的道德教育，和基本

文化知識的教學，其具體內容為經、史、文三大領域，歷史教學在其中佔有重要地位。中國傳統歷史啓蒙教材，大體以兩種形式編纂，一類為「典故類」，另一類為「通史類」。唐代李瀚所著的《蒙求》是「典故類」的創始，其後有斷代為書的《左氏蒙求》，以及內容更豐富的《龍文鞭影》。它們的共同特色是，介紹許許多多古代歷史人物的嘉言懿行，以作為兒童學習效法的楷模，而達到鑑戒的歷史教育目標。這一類啓蒙教材的缺點是，缺乏歷史的時間深度，只是一個個不相連屬、零散的人物事蹟，無法瞭解歷史的整體發展。「通史類」的歷史教材則彌補了此一缺失。其中宋代出現的《三字經》以其用字簡練、組織系統化、內容廣泛實用，成為中國流傳最廣的童蒙書。其他還有難度較高、內容較深的《敘古千文》與《歷代蒙求》。《敘古千文》深受宋代理學思想的影響，相當具有時代精神與史觀，帶有濃厚的哲學氣息。《歷代蒙求》則較為平實。「通史類」的歷史教材，以時間演化為主軸，細數歷代帝王、興衰絕續、統合分離。已包含有重要人名、時間、地名、專有名辭等歷史基礎知識，並加以因果分析，以及歷史人物評價與春秋筆法的批判，是頗為完整的歷史教材。

不論是「典故類」或「通史類」的歷史啓蒙教材，都充份的利用了漢字單音、獨體、方正的特色，在編寫形式上一律採用三字、或四字一句的對偶句式，並聯以音韻，讀來順口、聽來悅耳，既易于記誦，又能提高兒童的興趣，也增強其作詩、對仗、押韻的語文能力。透過這些教材，讓我們瞭解前人在編寫歷史教科書的的經驗傳承與智慧結晶，這六種教材，只是眾多歷史啓蒙教材中的一部份，還有更廣大的領域有待開發與研究。

（本文作者為台北市蘭雅國中教師）

註 釋

- 1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里仁書局，民83年12月30日出版，頁52-53。
- 2 參見王仲孚〈最近四十年台灣地區歷史教育論文目錄〉，《歷史教學雙月刊》1卷5期，民78年3月，頁130-146；以及王仲孚，〈最近六年台灣地區歷史教育論文目錄〉，《中等教育》46卷第1期，1955年2月，頁111-124。
- 3 李弘祺〈傳統中國的歷史教育——以宋代為中心〉《史學評論》，第十一期，民75年1月，頁4。

- 4 林文寶《歷代啓蒙教材初探》，台東師院語文教育學系，民八十四年四月初版，頁1。
- 5 劉秀生、楊雨青《中國清代教育史》，百卷本中國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頁29-30。
- 6 孫伯醇、村松一彌編，《書生禮拜之圖》，《清俗紀聞》，東京，平凡社出版，1994年10月，頁12。
- 7 丘賢堯主編，《惠州市教育志1800-1987》，惠州市惠城區地方志叢書，教育局《教育志》編寫組，1988年12月，頁50。
- 8 同前註，頁50。
- 9 殷登國，《圖說360行》下冊，台北，民生報出版，民74年，頁768。
- 10 胡澹原輯、錢慎齋增訂，《繪圖解人頤》，台北，新文豐，民69年，頁67。
- 11 《學館諸生列位之圖》，同註6，頁16。
- 12 毛禮銳、沈灌群主編《中國教育通史》第三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7年6月第1次印刷，頁461。
- 13 陳東原《中國教育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69年12月台四版，頁311。
- 14 同註9，頁775。
- 15 同註10，頁65-67。
- 16 同註10，頁67。近來，大陸學者發現《塾師四苦》為著名文學家蒲松齡所作。見《文獻》1988年第4期，北京，北京圖書館，頁61。
- 17 同註9，頁784。
- 18 崔學古《幼訓》，轉引自同註12，頁467。
- 19 唐彪《父師善誘法》，轉引自同前註，頁467。
- 20 瞿宣穎纂輯《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下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61年1月台2版，頁816。
- 21 朱熹《童蒙須知》，轉引自同註12，頁44。
- 22 朱熹《小學書題》，轉引自註12，頁45。
- 23 毛禮銳、瞿菊農、邵鶴亭編《中國古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4月第4次印刷，頁415。
- 24 曹思彬、林維熊、張至《廣州近百年教育史料》，廣州文史資料專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民1983年12月，頁79-80。
- 25 林文寶《通古才足以變今—傳統啓蒙教育鳥瞰》，《國文天地》6卷4期，民78年9月，頁14。
- 26 江應龍《且說私塾》，《國文天地》6卷4期，民78年9月，頁43。
- 27 熊明安、徐仲林、李定開主編，《四川教育史稿》，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7

- 月第一版，頁185。
- 28 同註26，頁43。
- 29 同註4，頁43。
- 30 《百家姓、千字文》，台北，易知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61年1月，頁53。
- 31 林文寶〈關於『蒙求』〉，《國文天地》6卷4期，民79年9月1日，頁10。
- 32 同前註，頁261。
- 33 張文建，〈論傳統史學方法〉，《中國史研究》季刊，1992年第2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頁138。
- 34 同註31，頁261。
- 35 余嘉錫撰〈四庫提要辨證·蒙求集注二卷〉《叢書集成新編》第33冊，台北，新文豐，民80年，頁259。
- 36 以上各故事，詳見李翰撰，徐子光注《蒙求集注》，同註35，頁226-228。
- 37 轉引自〈四庫提要辨證〉，同註35，頁261。
- 38 同前註，頁261。
- 39 陳振孫〈直齋錄解題〉，轉引自方師鐸〈傳統文學與類書之關係〉，台中，東海大學，民68年，頁272
- 40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同前註，頁226。
- 41 如唐代的劉知幾、宋代的司馬光、清代的馬驥、章學誠、以及近代的顧頡剛。同註3，頁9-11。
- 42 吳化龍纂，許乃濟、王慶麟注《左氏蒙求》，《叢書集成新編》第33冊，台北，新文豐，民80年，頁264。
- 43 戴表元〈左氏蒙求註·序〉，同前註，頁264。
- 44 戴表元〈左氏蒙求註·序〉，同註42，頁264。
- 45 徐復觀，〈原史——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學的成立〉，收於《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台北，華世出版社，民69年3月，頁48-52。
- 46 楊立武、羅波編著，《龍文鞭影譯評》，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11月，頁1。
- 47 蕭良有纂輯，楊臣諍增訂《龍文鞭影》，台北，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60年9月，頁1。
- 48 同註23，頁429。
- 49 同註47，頁1。
- 50 林曉平〈說史學上的“借鑑”與“勸戒”〉，《史學史研究》1993年第一期，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頁77。
- 51 胡昌智〈由鑒戒式到演化式的歷史思想——一個中國近代史學結構變遷的初步觀察〉，

- 《東海大學歷史學報》，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民75年12月，頁2。
- 52 同前註，頁1。
- 53 黃沛榮，〈三字經導讀〉，《新譯三字經》，台北，三民書局，民81年3月，頁12-13。
- 54 同前註，頁17。
- 55 劉子健〈比《三字經》更早的南宋啓書〉，《兩宋史研究彙編》，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76年11月，頁304。
- 56 同註53，頁35-36。
- 57 同註53，頁36-37。
- 58 王仲孚，〈再談歷史教學的基礎知識〉，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主編《歷史教學研究》，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82年4月初版，頁52-53。
- 59 王仲孚，〈國中歷史科的性質與歷史教學的基礎知識〉，《歷史教育論集》，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民86年第一版，頁232。
- 60 同註53，頁11。
- 61 同註53，頁30。
- 62 同註51，頁38-40。
- 63 朱熹，《敎古千文〈跋〉》，叢書集成新編第33冊，台北，新文豐，民80年，頁280。
- 64 李昉英，《敎古千文〈跋〉》，同前註，頁280。
- 65 同前註。
- 66 李澤厚，〈宋明理學片論〉，《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台北，三民書局，民85年9月，頁234-235。
- 67 胡寅撰，黃灝注《敎古千文》，同註63，頁273
- 68 同註66，頁237。
- 69 同註67，頁273。
- 70 同註67，頁276-280。
- 71 同註64，頁280。
- 72 王芮撰，鄭鎮孫注《歷代蒙求》，台灣商務印書館。宛委別藏，民70年10月，頁55。
- 73 鄭鎮孫，〈歷代蒙求纂註序〉，同前註，頁46。
- 74 王萱，〈歷代蒙求跋〉，同前註，頁56。
- 75 同前註，頁56。
- 76 同註72，頁30-33。
- 77 同註73，頁46。
- 78 潘德深著，王仲孚校訂，《中國史學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83年5月，頁163-164。
- 79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二)，台北，三民書局，民77年2月，頁237-238。